

姜亮夫全集

姜亮夫全集

一
楚辭通故 第一輯

雲南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姜亮夫全集. 一, 楚辭通故. 第一輯/姜亮夫著.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0
ISBN 7-222-03519-2

I. 姜 ... II. 姜 ... III. ①姜亮夫 (1902 ~ 1995) —全集②楚辭—文學研究 IV. C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2) 第 061728 號

一九九〇年姜亮夫先生攝於杭州大學



姜亮夫全集序

李學勤

一九九九年，雲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一套《姜亮夫著作選本》，很受讀者歡迎。現在又出版二十四卷本《姜亮夫全集》，使我們能夠窺見這位著名學者畢生功業的全貌，實在是值得感謝的。

二十世紀已經成爲歷史。從一九〇〇年庚子之變起始，百年間風雲變幻，中國的學術進程也是一波三折，路轉峰迴。然而這正是巨人輩出的時代，在知識界、文化界湧現出多少傑出成果，代表人物，一時難以計數。與民國初年的有識學人重視回顧總結清朝的學術發展一樣，今天有必要深入研究二十世紀的學術史，因爲就是這上世紀的學術，決定着我們此後前進的起點和方向。

近幾年，各地印行了很多上世紀學者的文集、資料、年譜、日記，說明這一時期學術史開始爲大家所看重。有關文獻非常珍貴，亟待搶救，但是數量龐大，輕重先後，不能不有所抉擇。最重要學者的著作，當然應該首先整理問世，而這方面的工作又每每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投入相當大的力量，《姜亮夫全集》便是這樣。

姜亮夫先生名寅清，雲南昭通人。他生於一九〇二年，卒於一九九五年，幾乎與世紀共始終，而他的學術生涯，亦同百年間的潮流形勢密不可分。讀姜先生《全集》，如能以其各時期學術活動和作品，與前後社會文化大勢結合觀察，自能有更多的理解和體認。

由《全集》不難看到，姜亮夫先生治學精深博大。他在一九二六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即一般艷稱的國學研究院，以《詩騷聯綿字考》論文卒業。這是他主要的學歷，不過他講述自己的師承，總是更廣泛得多。一九四六年，姜先生曾集合過去蒐輯材料，纂有《四先生合譜》一書，記述先後問學的廖平、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四人學術行事。「文革」後，作《思師錄》，則于四川林山映、龔向農外，特列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和陳寅恪。姜先生的學問，究其實是兼採衆長，自成一派，這恰是名學者的大家風度。

清華的一貫學風，是古今貫通，中西融會。姜亮夫先生於三十年代廣讀馬克思、恩格斯及摩爾根、穆勒利爾、梭羅金、涂爾干等人的著作，並於一九三五年赴歐洲，於巴黎大學進修考古學。他與馬伯樂、伯希和、戴密微、葉慈、翟理斯等英法漢學家結識，且在法京國民圖書館應王重民先生之邀，檢閱敦煌卷子，多有收獲，足見他的學術，絕非閉門墨守者可比。

至於他的研究範圍，由後學看來，更是寬無涯涘。《全集》前言所舉，即有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歷史學四大方面，而在這些方面他都有為學人所必讀的重要著作，其貢獻之大，乃世人共見。

看他在一九四一年寫的《四十自述》，自云：「方余十歲而國變作。年十六時，百家競爽，千說輻輳，故常改觀，矩矱未立。十八以後，學經爲文，讀史游藝，半緣時染，非有心主。行年四十，讀數萬卷書，行萬里路，師事大儒，交接通人，而無一能名。」語雖過謙，也足見其途徑坎坷曲折。接着說：「嗟乎！使時

濟清和，民瘼已定，興廢不忘於匹夫，禮樂可求於野人，則但冀優容一日，歸家供養。借東萊之田，奉朝夕之旨，服事之暇，則以學文。有屋三椽，文書百架，游息詠思，以竭吾才，深自克責，可無大過。」尤表達出他寧靜澹泊的精神志向。

建國後，他度過一段安定順利的時光。繼而遇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於極端困苦的條件下，仍然堅持學術工作。到了改革開放，他已是八十高齡，加以衰病，竟能創辦研究所，開設講習班，招收博士、碩士學生數十人，主持多種學會，出版十餘部專著，百多篇論文。秉燭之年，成爲一生中最高輝煌的段落，這豈能只用「暮暉」、「餘熱」等詞來形容？希望《姜亮夫全集》的讀者注意作品的寫作發表時間，就知道我們的老學者只要能「優容一日」，「以竭吾才」，即將在質和量上達成怎樣的成果。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曾提出建議，編纂《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編年》。在建議中我說：「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頭緒萬千，研究任務繁重艱巨，爲了系統整理資料，展現各歷史時期學術演變的全貌，並將學術展放在整個社會變革的背景中來考察，建議編著《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編年》，并在此基礎上籌備編著多卷本的《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隨後讀姜亮夫先生著作，才知他自一九三〇年便輯有《近百年學術年表》，我的陋見只是在時限上後移而已，不由得驚嘆姜先生的卓識和我自己的謬陋。

前人談讀書，言讀其書而知其人。而知人足以論世。我們讀這部《姜亮夫全集》，不僅可明其學，兼可以知人論世。謹在此對《全集》的編輯、出版者，表示衷心的敬意。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三日于清華

姜亮夫全集前言

一位幾乎與二十世紀同始終的老人，一位經歷了百年滄桑的世紀學者——姜亮夫先生，以其豐富的教學與科研成果、敦厚耿直的一生，為中國的學術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也是二十世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作出卓著貢獻的衆多學者中有代表性的一員。為了保留姜亮夫先生的學術成果，給後人留下一份值得學習、研究、借鑒的文化資料，我們編輯出版了《姜亮夫全集》。

一

姜亮夫名寅清，以字行。一九〇二年出生於雲南昭通一個以教書為生的家庭。其父親姜思讓，畢業於清末的京師大學堂，是一個頗具維新思想的人物。武昌起義後，他回到家鄉領導地方的『光復』事業。

雲南護國之役，他又領導昭通募捐濟軍反袁。姜亮夫先生自幼受父親影響，成爲一個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青年。此後，在他的一生中，從未忘懷過民族與國家的命運。

姜亮夫先生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六年就讀於昭通兩華小學，一九一六年考入雲南省立第二中學。一九二一年以本省官費生考入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在林思進、龔道耕二先生的指導下，讀完了《詩經》、《尚書》、《荀子》、《史記》、《漢書》、《說文》、《廣韻》諸典籍，爲日後的中國文化研究植下了深厚的根基。他在自傳中說：「這些都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基礎，自以爲這是我一生治學的得力處。龔先生說這些書好似唱戲吊嗓子、練武功。林先生教人說，作詩不可從讀詩話、讀史不可從讀史論入手，這些話使我一生奉爲圭臬。」大學期間，他開始發表詩作與論文，並完成《昭通方言疏證》的初稿。一九二六年，姜亮夫先生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未幾，又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諸先生問學，在王國維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畢業論文《詩騷聯綿字考》。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姜亮夫先生應清華同學黃淬伯的邀請赴南通中學教書。一九二八年赴無錫中學任教，其授課記錄後來整理爲《文學概論講述》四卷（一九三〇年，上海北新書局刊行前二卷）。因王國維先生蹈昆明湖死，姜亮夫先生極爲感傷，聯想而及屈原，於是開始了他對楚辭的研究。在兩年中學任教時期，始抄錄所見楚辭資料，並着手撰寫《屈原賦校註》。

一九二九年，姜亮夫先生以胡樸安先生之介，任教持志大學、中國公學。至一九三三年間，先後任大夏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持志大學教授，並任北新書局編輯。其間拜章太炎先生爲師。章氏指導他從杜佑《通典》入手讀史，並告誡他要做一個真正的學人，不作空疏之學，不作嘩衆取寵之學，給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這數年間，姜亮夫先生開始許多文稿的著述與資料的搜集，如《漢字結構基本精神》、《屈原賦校註》、《歷代文論詩經兩校輯》（此稿已佚），並為北新書局編錄了多種文學作品選本，或為註、或為序，頗為三十年代文學青年所歡迎。同時，在《語錄周刊》、《北新半月刊》、《申報自由談》等刊物上發表文章百餘篇，惜多用筆名為之，故今天已散佚不可求了。一九三二年，撰成《夏殷民族考》、《甲骨文字小箋》、《家的來源》等文的初稿，一九三三年成《甲骨學通論》。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受聘河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期間，姜亮夫先生讀了大量唐、宋、五代人的文集及史書，輯錄名人生卒，後又通考唐以前、宋以後名人資料，終成《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為學術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至今仍是文史工作者案頭常用的檢查歷史人物的重要工具書。並初草《文字樸識》、《尚書新證》等稿。

一九三五年八月，姜亮夫先生赴法國巴黎大學博士院進修，主攻考古學。時遇友人王重民，相約摹錄為伯希和所劫諸敦煌經卷，並親見了許多劫自敦煌的藝術品。後來又遊學倫敦、羅馬、柏林等地。西方學者整理文物、研究學術的科學方法給了他極大的啟迪。在紮實的國學基礎上，引入西方學者的思維方法和治學方法，奠定了他一生綜合治學的堅實基礎。同時，為了臨摹、拍攝流落異國他鄉的敦煌經卷、文獻，他毅然放棄了巴黎大學的進修，傾其所帶經費，全力投入敦煌卷子的攝錄工作。從此走上了敦煌學研究之路。他在《四十自述》中關於這段歷史有較為詳細的自述：『二十五年之夏，遊觀略遍，遂訪書於國民圖書館。因友人王君有三之助，得觀敦煌遺簡，雖非所好，而知其為瑰寶，因自思量，發為宏願，倘能更臧其事，蓋亦有當於學術之鼓吹，勞瘁之力，尚可一賈，遂排日入館，選字書、韻書、五經、老子之屬，

擇其要者，抄寫響拓，攝影校錄，日書數卷，垂暮歸寓，更即燈下，比次論列，夜深漏水，絕不知疲，凡得百數十卷。』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事一觸即發，姜亮夫先生冒險取道西伯利亞回國。未幾，『七七事變』爆發，一路遷徙，各地奔波，致使姜亮夫先生在巴黎等地攝影、抄錄帶回的諸多敦煌卷子和一部份未竟手稿毀於戰亂。

一九三八年，姜亮夫先生與陶秋英女士在上海結為伉儷，後夫婦倆經香港、河內轉至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姜亮夫先生任東北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在後來四年多的時間裏，夫婦倆在三台專心致志整理從歐洲所得的敦煌《切韻》卷子，研究、撰寫、編排，完成了近代中古音韻研究的一大巨著——《瀛涯敦煌韻輯》。先生目力因此大損。

一九四二年，因父喪返昭通後，姜亮夫先生遂留任雲南大學教授、文法學院院長，撰寫成《張華年譜》。《護國軍誌》、《護國軍文徵》，重新編定《昭通方言疏證》。當時政局混亂，百業衰敗，先生曾撰寫有關當時的時政、學術、文化、教育、社會、經濟等問題的短篇評論文章，發表於昆明、重慶等地的報紙，對時弊多有抨擊，後集為《揮戈集》，惜稿已佚。因文章均用筆名，恐很難恢復了。

一九四七年，姜亮夫先生轉至上海，就職於同濟大學、復旦大學。後經顧頡剛先生介紹任英士大學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修訂《張華年譜》。並始著《楚辭書目五種》等書稿。

一九四九年到昆明，任昆明師範學院教授，應當時雲南省主席盧漢邀請，任雲南省教育廳廳長。後任雲南軍政委員會文教處處長。姜亮夫先生兩次任教滇省，及在教育廳長任上，極想為家鄉的教育事業

做點實事，諸如調整雲南大學文理學院的結構、課程，培養本地人才，增發教授工資，調整中學教育結構、教學內容等，但因時局動亂，世風日下，許多良好願望或難以實施，或收效甚微，在其日記中大體可見他當時的概況和心態。一九五〇年始譯屈原賦。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進革命大學學習十四個月，一九五二年調雲南省博物館工作。曾主持重修昆明的圓通寺古剎，從製圖設計到施工監督皆一人爲之。一九五三年因病辭職，同年底，奉教育部調令，調任浙江師範學院教授。

此時，姜亮夫先生已經年過半百，還一身疾患。政局動蕩，半生顛簸，是多種疾病的根源。他雖然熱愛教育，專注學術，但因早年經常遷徙，難以靜心於學術研究，不少學術著作常常是在戰亂途中、防空洞裏經過多次艱苦工作，始得以撰成。也因爲生活的流動性大，許多計劃撰寫的書稿，或僅完成資料搜集、或僅爲草稿、或僅定綱目、或僅成一半。極爲可惜的是，還有相當數量的書稿在動蕩中損毀、佚散。直到定居杭州以後的四十多年中，姜亮夫先生才得以一面治養沉痾，一面靜心地教書育人，並潛心於他所鍾愛的學術研究。雖然其中有『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但姜亮夫先生畢竟過了四十多年較爲寧靜而簡樸的生活，可以說，調到浙江師範學院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折。由此，迎來了他的由動而靜、由耕耘而收穫的四十年。

自一九五四年起，他一面爲研究生上課，一面開始着手撰寫、修訂以歷史、語言、楚辭、敦煌爲主要研究內容的一系列書稿。

一九五五年姜亮夫先生繼招第二屆古漢語研究生班，學生共八人。並接受教育部委託，編寫全套古漢語教材，後來，其中的文字部份改寫爲《古文字學》出版。

一九五六年起，姜亮夫先生任浙江師範學院（後改爲杭州大學）中文系主任，並全力修訂《歷代名年里碑傳總表》。此時，他的主要精力還是致力於教學。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前後，因疾病纏身，他的教學、科研、著述等活動受到牽制，故此時他主要以養病爲主。至一九五九年，他已修訂出版了《陸平原年譜》、《張華年譜》、《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瀛涯敦煌韻輯》等書，並開始着手整頓中文系的系務工作。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間，是姜亮夫先生一生活較爲穩定，事業順利發展的時期。他的健康情況逐漸好轉，生活趨於安定。這爲他的教學、科研活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期間其主要活動大體有三部份：

（一）堅持教學。這始終是姜亮夫先生生活的主旋律，他在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二年各招兩屆古漢語研究生，並在一九六四年招楚辭專業研究生。他爲各門功課自編講義，親自上課、批改作業。他尤其重視因材施教，根據每個學生不同的個性、水平，分別選定不同的題目並輔導各人的作業、畢業論文。這十年是他最盡心教學的十年。他不僅在學業上幫助、指導學生，而且關心他們的生活，對於他們在經濟、婚姻、家庭方面所遇到的問題也盡力提供幫助。真正是授業以解惑，導理以正德。在中文系主任的任上，開始着手以他的教學思想修訂中文系的本科生培養方案，整頓資料室的學術資料服務工作。

（二）開始有較爲廣泛的學術交流。一方面與國際友人如捷克的鮑格洛，日本的神田喜一郎、稻田耕一郎、林已奈夫等，以及前蘇聯、法國、瑞典等國的漢學家都有學術交流；另一方面在國內也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活動，每年都有與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諸多同行學者的互訪、講學等活動。

(三)完成了一批重要的著述。十年中，他認真地對過去諸多未出版的舊稿逐一進行清理、修訂、增補，或成單篇論文，或集結成書，定稿和出版的有《楚辭書目五種》、《昭通方言疏證》等。另外，他在學術上的最大成就當屬完成《楚辭通故》一書。這是姜亮夫先生在大量匯集歷代楚辭研究資料的基礎上，以他比較成熟的學術思想體系和以個別分析同綜合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哲學、歷史、地理、語言、文字、文物考古、民族學、民俗學等多學科入手，進行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常年辛苦，孜孜不倦，日書數百字，積十年之功而告完成的。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姜亮夫先生也受到一定的沖擊，但由於他在青年教師與學生中的威望較高，德行可敬，相對尚算平安，只是健康頗損，而損失更大的則是好多書稿被毀。如《揮戈集》、近四分之一的《楚辭通故》原稿和多篇文章均散佚無歸。然而就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的十年間，他困居於十平方米的斗室中，以一尺見方的書桌兼飯桌的一角為工作臺，鏗而不捨地辛勤工作着，在當時人們看來已經被徹底破壞的傳統文化領域執着地追求着，他專戀於祖國傳統民族文化的癡情，支持他苦苦地堅持着自己的事業。這一時期，姜亮夫先生的生活也極為艱苦，女兒分配在外地工作，二老相依為命，有時僅以炒米粉果腹。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將諸多書稿逐一修訂、重寫、補全。雖然每天只能工作二三小時，撰寫一二百字，但就是靠着二十多年滴水穿石的功夫，姜亮夫先生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學術著述，並迎來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科學、教育、文化復蘇的時期。他以近八十歲的高齡，再一次進入教育、學術領域收穫的高峰時期。

一九七九年，姜亮夫先生受聘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先秦文學分卷副主編，九月受教育部委託舉辦楚

辭學講習班。一九八三年，他以八十二歲高齡接受高教部的委託組建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並擔任所長和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一九八三年舉辦敦煌學講習班。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他招收博士生十人，碩士生數十人，親自為研究生上課。他重視打基礎，延聘諸多的外校外系教師廣開課程，積極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並擔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會長，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學術顧問，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學術顧問，浙江省語言學會會長，《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浙江省政協委員等職。這十年也是他著述出版的大豐收時期。計有《古文字學》、《楚辭通故》、《莫高窟年表》、《楚辭學論文集》、《敦煌學論文集》、《敦煌學概論》、《楚辭今繹講錄》、《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敦煌碎金》、《重訂屈原賦校註》、《昭通方言疏證》、《屈原賦今譯》等十餘種專著出版，並有百餘篇論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中華文史論叢》、《中國文化》、《文學遺產》等各種期刊、雜誌。

一九九二年起，姜亮夫先生因病臥床，住院治療達四年之久，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病逝於杭州浙江醫院，終年九十四歲。

綜觀姜亮夫先生一生的經歷，自稱『鈍根人』的他，以鏗而不捨的精神，數十年如一日地讀書、教書、著書，最後終有善果，成爲二十世紀衆多有成就的著名學者、教授之一。我們閱讀他的著述，不僅獲得一份二十世紀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國學術文化的寶藏；而且可以從《姜亮夫全集》所收的日記、回憶錄中得
到年輕學人健康成長的有益啟迪。

關於姜亮夫先生的學術著作和成就，人們習慣於以楚辭、敦煌、語言、歷史四大類來分別之，《姜亮夫全集》也基本依此框架列目分卷。但嚴格來說這是不很妥貼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或許只是從書名上得到的結果。我們如果簡單回顧一下他治學思想體系的成因、淵源，則不難看出應當全面、多角度地去綜述他的學術內涵。

姜亮夫先生自幼受家學熏陶，以儒學啟蒙，進成都高師後進一步於經、史、小學再加深造；其後考入清華，京都人文薈萃，名師如林，使其視野大為開闊，於文學、歷史、哲學、考古，乃至天文地理都有所涉及，師從章太炎後又以歷史、音韻學為主課。所以他在《古史學論文集序》中說：

我一生治學至雜，但也有個不太明顯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辭、漢語、敦煌、文學等沖淡，而史學的問題自『五四』以後，非常龐雜，學說紛起，新材料也時時發現，我在這潮流中，追逐不已，為許多科學性強的學說所震撼……下決心走樸學道路，與史學正式接觸，曾發願註《後漢書》。但王先生昆明湖之痛第一想到屈原，所以廿八歲寫就《屈原賦校註》，從此對古史接觸多了，於是才擴大為古史學的研究……我這些時候全學正統派史學，加入點疑古成份……我主張讀莫爾干《古代社會》，所以我釋禹為夏民族的宗神（圖騰）。而我對古史的民族問題也漸見成熟，我第一次提出『龍』、『鳳』兩

大系，即夏、殷兩民族的說素……寫了一篇五萬字的《夏殷民族考》……我此時雖然已讀了不少古代社會史的書，而此文不無一些影響，然大體說來只是有些文化人類學的踪影……即在此時我對漢語文字語音之學，也不廢掉……，我寫了一部份古文字研究的論文，為我後來寫《文字樸識》的基礎……到巴黎，我看了巴黎的四十多個美術博物館，倫敦的大不列顛博物館，加深了我如何用科學方法研究古籍的想法……綜合了上面各點，我回國後才打定主意，終身以古文獻及敦煌學為治學方向。

由此可以看出他在深厚的舊學根基上，以歷史、語言與西方哲學及科學治學方法的交融開始了他的著述歷程，因而；如果依現在的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歷史學的分類來描述他的學術成果，其實就有了一些『誤導』之嫌。嚴格來說楚辭、敦煌文獻或許只能算是一種『載體』——一些個研究對象。《楚辭》作為一部文學作品，首先當然是文學的《楚辭》，但與其有關的則有訓詁、楚方言、楚史、楚文物考古、楚地理、楚民族民俗等更廣泛而與屈子、楚賦有關的門類，可供學者們拓展其研究領域，於是有了楚辭學之稱。敦煌學亦然，例如有藝術的敦煌、儒、釋、道三家的經典，敦煌文學乃至於有戶籍、典冊、地理、歷史存留於敦煌藏窟中，是可從不同學科角度去研究的各種資料。

由於姜亮夫先生對楚辭及敦煌進行了較為廣泛精深的研究，著述較多，於是人們習慣稱之為楚辭學家、敦煌學家。其實，我們今天來介紹其學術成就，更應着眼於他在這些學科中研究了什麼，用什麼方法研究。換而言之，就是在這些著述中讓讀者去體會與理解他的治學特點與方法，從而更清楚地認識一位學者的著述的真正內容。